

第

二

卷

民国著名 人物传

严如平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

二

卷

民国著名人物传

严如平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著名人物传 (2)/严如平主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10
ISBN 7-5006-2357-7

I.民… II.严… III.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IV.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472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9.75 印张 2 插页 630 千字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3.60 元

序

李 新

《民国著名人物传》(四卷)是一部收录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界著名人物的传记集。我想,这不仅是了解这些人物生平事迹的一部好书,也是了解新中国昨天历史的一部好书。

研究中华民国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重视历史,以史为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1972年,当我们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时,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民国史应与党史、革命史有所分工,民国史应当主要写统治阶级,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消灭;封建主义怎样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怎样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旧民主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主要写统治阶级,是因为统治阶级确定了那个时期历史的主要特征。

既然要写统治阶级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在讨论民国史编写计划时,就确定要编《中华民国人物志》,给1000人写传记,将4000人列入民国人名词典,另外编制若干人物表。这也是我国两千年来历史学的优秀传统之

Et37/01

一。如今，我们从1000人中选出160人，写出一些较详细的传记，无疑会对民国史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打开二十四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历史学历来的传统是，既为开国元勋、名将大臣立传，也为奸臣、酷吏、儒林、游侠等各色人物立传。的确，我们从这些人物传记中，看到了生动、具体、多方面的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不仅要研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也要研究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对他们都应该实事求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分析研究，而不能简单地扣上好或坏的帽子。孙中山是民国开国元勋，一生为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但也有他的局限性；蒋介石专制独裁，反共分裂，但他在北伐与抗日中的表现，应当根据史实给予评定；即使是最后沦为汉奸的汪精卫，他在早年反清革命中的行动，也应有恰当的地位。只有这样，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才能得以如实地表述，历史的发展才能得到全面地展示，历史才能写得具体、详实、生动、丰富，才能给后人留下一幅历史的真实图画。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史学界一片兴旺景象，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可以称得上异常繁荣。回顾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出版时，在国内外颇引起一番震动，印数达15万册。因为在那之前的20年间，没有人敢为民国时期的所谓“反面人物”“树碑立传”。所以，《民国人物传》的问世，被海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认为是冲破了一个禁区，是大陆历史学研究进入新时期的标志之一。应当指出，那本书所收录的几十篇传记，是我们1972年后开始研究民国史数年中结出的第一批果实，而那一时期，正是极“左”思潮泛滥之时，所以大家虽然力图冲破各种框框的束缚，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地记述人物，但是今天看来，其中仍然有许多时

代的印痕而不能尽如人意。然而，它毕竟为新时期的人物研究开风气之先。此后，各种各样的传记著作纷纷问世，犹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

近些年来，民国人物传记出版不计其数。许多学者深入而广泛地发掘史料，对人物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作出公正客观的评判。这些传记中不仅有创立民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也有从民国总统到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统治中国22年最后流落到了台湾的蒋介石；不仅有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也有民主进步人士“七君子”和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不仅有工商界的张謇、荣氏家族，也有“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还有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陈公博……甚至一个人物有数本以至十几本传记问世，确实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人物传记写作如此繁荣，说明了一个事实，读者需要传记史学。确实，一本人物传记，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写照。人们可以从中激励意志，获取知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它给读者的教益是无穷的。

历史人物研究近十几年来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我认为可概括为一句话：摆脱了极“左”观念的束缚，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对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客观公允的评价。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时，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看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如是前者，我们应该肯定；如是后者，我们应该给以恰当的

批判。带着感情色彩评判历史人物，往往会出现偏颇；用今天的立场要求前人，也不公道。

我们强调将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体考察分析，绝不是说可以不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去片面、静止、孤立地强调历史背景。我们摒弃了好与坏之间绝对化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是非再去颠倒过来，甚至把错误说成正确，罪过说成功绩，这绝不是实事求是。

现在大家对实事求是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最起码也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必须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苦功夫。从事历史学研究，凭臆测、想当然，是最要不得的；带着成见去取舍史料，顺我者存，逆我者弃，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因循沿袭，书上已经写了，前人已经讲了，自己就不去发掘史料重新认识，甚至不加分辨地跟着走，就会以谬传谬，贻误读者。如果根据一枝半叶、片言只语或者不可信的甚至被篡改过的史料，轻率地作出重大史事的结论，也是不严肃的。说到底，这都是不肯下苦功夫。人们常说实事求是需要勇气，我说更需要毅力，要肯下苦功夫。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真知灼见，也才能勇敢地拨乱反正，提出实事求是的见解。否则，那种勇气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也就不是实事求是。

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上述看法，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近十几年来的历史人物研究，已经扫除极“左”思想的束缚，走出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在历史长河中搏击的各种人物，他们的经历往往是曲折多变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受到近百年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斗争的影响，许多人的经历功过杂陈、瑕瑜互见。用好人或坏人、革命派或反动派来概括，往往失之

过简。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言行，需要分别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我们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出发。历史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我们提倡对历史人物在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条理出他的思想脉络来。

实事求是已经蔚然成风，但是我们仍要不断警惕和防止“左”的顽症和形而上学的习俗。我们要把历史著作写得真实可信，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宁可写，也不要以讹传讹。

我已经年近八旬，没有精力阅读这套丛书的全部传稿，但是我了解到参加撰写丛书各篇传记的作者，都是对所撰人物有相当研究和见地的，其中有不少作者已经写出几十万字的传著问世。他们占有丰富资料，有多年研究的积累，又汲取了近些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写来不仅可信，并且不乏一家之言，文字也力求清新可读。可以预期，这是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传记著作，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然，这是一部多人撰写的传记合集，几位主编同志又力求保持各位作者的不同风格，所以难免参差互见。鉴于民国人物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丛书的作者和编者表示将虚心听取各界的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修正，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几位主编要我写一篇前言，我就写了以上这些，作为对这件有意义的事的一种支持。

1996年9月

第二卷 目录

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首脑蒋介石	严如平	(1)
新桂系领袖李宗仁	申晓云	(50)
豪门“国戚”孔祥熙	朱信泉	(74)
国民政府的“理财家”宋子文	朱信泉	(99)
蒋介石的智囊张群	陈一勤	(127)
学者从政的翁文灏	严如平	(153)
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	郑则民	(173)
被蒋介石尊为师表的吴稚晖	章立凡	(194)
CC 首领陈果夫	颜 平	(211)
跌宕起伏的陈立夫	严如平	(232)
被国民党称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	吴广义	(258)
民国政坛风云际会的孙科	徐梁伯	(276)
为蒋介石“跳火坑”的黄郛	郑则民	(294)
和平老人邵力子	陈仲丹	(312)
和平将军张治中	汪朝光	(330)
接管台湾的第一任长官陈仪	齐福霖	(349)
“民主先生”吴国桢	孙宅巍	(363)
驰骋外交舞台半个世纪的顾维钧	汪仁泽	(381)
促成国共携手抗日的民族英雄张学良	毕万闻	(399)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刘存善	(428)
仕途通达的朱家骅	刘敬坤	(452)

法学与外交兼通的王宠惠	郑则民	(468)
上海大亨杜月笙	乔还田	(483)
国民党军的大管家何应钦	熊宗仁	(508)
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陈诚	颜 平	(533)
从旧军人到民主斗士的冯玉祥	陈兴唐 陈晓清	(558)
新桂系的名将白崇禧	申晓云	(579)
国民党的股肱重将顾祝同	高秋萍	(607)
善始善终的赫赫战将卫立煌	严如平	(630)
蒋介石的反共“干将”胡宗南	余方德	(659)
凋落的名将杜聿明	朱宗震	(679)
佛门将军唐生智	孙宅巍	(697)
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贡献的傅作义	高秋萍	(719)
铁军名将张发奎	熊尚厚	(745)
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杨虎城	吴长翼	(763)
长城抗战名将宋哲元	齐福霖	(785)
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张自忠	齐福霖	(803)
彝族爱国将领龙云	谢本书	(819)
川军首领刘湘	何一民	(837)
一生反共的何健	周慧平	(855)
“南天王”陈济棠	周兴樑	(871)
“宁夏王”马鸿逵	王 劲	(888)
反复无常的盛世才	郭 驰	(904)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江绍贞	(920)

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首脑蒋介石

严如平

在一部 38 年的民国史里，蒋介石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是国民党统治中国 22 年的首脑人物。败退去台湾后，他又继续当了 25 年“总统”直至去世。他 88 年的一生，正值近现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对国家民族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功过是非，值得世人评说。

留日学军

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18 年起以中正为名，介石是 1912 年在《军声》杂志上署的笔名，后为字。他 1887 年 10 月 31 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奉化县禽孝乡溪口镇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兼营粮食、油饼、石灰等，为人精明，惟于蒋介石 8 岁时即染时疫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①抚育成人。王采玉笃信佛教，对子期望甚殷，管教很严。蒋介石对苦心抚育自己成人的母亲颇为孝敬。

幼年的蒋介石生性顽皮好胜，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②。他 3 岁时曾好奇地用筷子插进自己的喉咙，疼得几乎晕死过去；5 岁时到结冰的缸中去捞冰，倒栽进缸中，家人发现

后将其捞出已奄奄一息。他常常到门前的溪流中嬉闹，山洪下来，他亦跳入水中不怕危险。他还爱好玩弄刀棒，常常聚集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喜欢自封为大将登台指挥，还搞恶作剧吓弄同伴。他母亲觉得难于管教，5岁那年将其送入塾馆。他辗转了8个塾馆，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逾10载，深受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熏陶。1903年起，他先后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除经史等及《孙子兵法》外，兼学一些英文、算术、理化等新知识，并阅读来自上海和杭州的各种报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箭金公学的教师顾清廉授以富国强兵之说，晓以留学异邦之理，蒋介石深以为是。

少年的蒋介石接触新思想，正值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民族危机严重，救亡图存的呼声四起，孙中山已经在日本东京成立起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革命浪潮正在全国兴起。蒋介石从一些报刊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加上他因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受乡绅欺负^③，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以寻求出路。他毅然剪去发辫，于1906年4月东渡日本。他原是想学习军事的，但军事学校学生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送，乃不得不入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日语。他在东京结识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他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他性格骄躁，容易激动，小时候就有“红脸将军”的诨名。在学堂学习时，有一次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课，把一块泥土比喻中国，说这块泥土里有4亿个微生物。蒋听了感到受辱，走向讲台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问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块泥土中呢？！日本教官恼羞成怒，说蒋是革命党，要求学堂严办，学堂总办知道蒋

是有理的，只是申斥一番了事。

1908年春蒋介石被陆军学堂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军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所学课程，日语占五分之二，军事知识约五分之一多，其他数学、物理、博物、史地等加起来还不到五分之二，社会理论则完全没有。这种封闭的军事教育和刻板的武士道式的训练，正是清政府培养忠于皇上、服从长官的“新式军官”所需要的。

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张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且肯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④表现出一番革命豪情。

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结束后，被日本军方编入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第十九联队驻于新潟县高田镇（今上越市），这里天寒地冻。蒋介石在这里强忍着严寒的气候、低劣的伙食和严格的纪律，经受了军营生活的磨练，也更加深了对武士道精神的印象。他后来常常以在日本的这段生活教育国民党军队将士，说自己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要洗刷拖炮的马匹；晚上操练回来，又要为马擦洗一遍，还要为下级士官的靴子刮清污泥。

投身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声震九州。蒋介石在日本接到陈其美催他回国的电报，即约同张群、陈星枢向联队长请假，从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得川资，化装回国，于10月30

日到上海。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紧张筹划江南诸省起义，蒋介石立即被陈其美派往杭州，在顾乃斌家与革命党人商议起义诸事。蒋回上海向陈其美汇报，并筹划汇款、运械、接济等事。陈其美立即派蒋介石、王金发等 7 人同率敢死队员百余人，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药等于 11 月 2 日赴杭州。11 月 4 日夜，光复杭州之役爆发，蒋介石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配合步兵攻打巡抚衙门取得胜利。

浙江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这时陈其美已是沪军都督，蒋介石被派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他与陈其美、督署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安危同仗，甘苦共尝”为誓言。蒋介石血气方刚，一切惟陈其美马首是瞻。他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于 1912 年 1 月 14 日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⑤。孙中山严令缉拿凶手，他畏罪避往日本，学习德语，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他在东京创办《军声》杂志，在发刊词中说：“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夫既以权力为胜负，则俾士麦所倡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⑥公开鼓吹俾士麦的铁血主义。他的这种强烈的军事权力的思维方式，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格格不入。

1913 年 3 月，袁世凯杀害国民党人宋教仁，并图武力消灭国民党。7 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于 1912 年底潜回国内的蒋介石，也参加了上海的反袁武装斗争。他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战斗。8 月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党人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于 10 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 月亡命日本。嗣后他

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斗争，曾去东北活动，又先后参与策动肇和舰起义、攻夺江阴要塞等斗争。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党歹徒杀害，蒋抚尸恸哭，雇车载尸回到自己的住所入殓，并撰祭文哀悼。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感到孤寂无援，乃先后与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军务部长许崇智以及吴忠信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取得攀附。

取信中山

以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唾骂声中，于1916年6月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而担任国务总理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民国名存实亡。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高举护法大旗，组建军政府。蒋介石先被孙中山任命为参军，后奉派于1918年春到粤军中工作，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曾拟“援闽”作战计划。“援闽”之役，蒋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

但是，蒋介石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及一些粤籍将领格格不入，屡屡离职回上海或奉化老家。据统计，在1918年3月至1922年6月的4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擅自离职达8次之多，实际到职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半。其原因虽然有粤军将领排挤倾轧等因素，从蒋介石方面来看，则是个性暴躁，自视甚高，不能满足权欲，不能以大局为重专心于军职。孙中山曾劝导他说：“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齟齬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⑦但蒋介石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告诫。他曾向孙中山要求出国留学，未

获同意，意志消沉。1920年前后他在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合股经营证券投机生意，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期间他结识了虞洽卿、杜月笙等上海“闻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却萌发了勃勃的野心：“要赢得我们领袖孙中山的信任，以便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要成为一个中国惟一的军事领导人，并且要将全中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⑧他处心积虑地博取孙中山的信任和青睐，曾经写过《对北军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等军事意见书一再呈送给孙中山，但都未能遂其攀援而上之心愿。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参与拟订北伐作战计划。蒋对陈炯明心存异志、阴谋叛逆早有看法，建议孙中山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但未被孙中山采纳，遂于4月悻悻返回上海。

机遇突然降临到蒋介石的头上：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悍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欲置孙于死地。孙脱险后避往永丰舰与叛军作战，18日电蒋“事紧急，盼速来”^⑨。蒋权衡利弊得失，认定不能错失这个冒有风险的机遇，在向张静江作了一番托付后，于29日抵达粤海，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被孙授予海上指挥全权，与叛军相持42天，直至8月10日因为势已难挽，遂护送孙离开粤海返沪。蒋介石回到上海后，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述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两个月间的情况。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称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⑩。

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因为帮助孙中山度过了一个难关，大

大提高了政治声誉，也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孙中山虽然也看到蒋介石“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齟齬难合”，但认为他“勇敢诚笃”又“知兵”^①，是朱执信去世后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乃于 10 月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组织为“东路讨贼军”征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之时，任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但是蒋介石依然故我，到职后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②，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 年 2 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而蒋此时心绪纷乱，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③，迟迟未去广州视事。经同志多次劝导，4 月去了广州，7 月又离职去香港，要求孙中山让他出国 5 至 10 年远游。

这时，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过多次商谈，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在香港的蒋介石闻讯后，写信要求孙中山派他去苏。孙中山为照顾他的情绪，鼓励他好好工作，同意他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 4 人赴苏联学习考察。他兴高采烈，在苏联会见了党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考察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后的建设，参观了工厂、农村和苏维埃组织，并着重了解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以及红军的政治工作等，历时 3 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很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很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是反感，认为苏联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别有用心，是没有诚意的。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总之，苏联之行反而增加了他对苏联的疑虑和偏见，是为其后终生反苏之滥觞。他后来